内生动力与外源赋能：乡村民宿双轨复合驱动乡村振兴研究*

冯丹娃，孟　佳

（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25）

摘　要：乡村民宿具有整合乡村资源和激活多元价值的作用，是连接乡村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关键纽带，也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文章构建“内生—外源”双轨复合驱动框架，系统阐释民宿产业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民宿产业驱动乡村振兴的力量深植于内在资源禀赋、充足人力资本和独特情绪体验的“内生动力”；同时，也离不开外部系统中全面政策指引、多元市场需求与创新智能管理的“外源赋能”。“内生动力”与“外源赋能”相互激发、共生演进。基于此，进一步提出资源与市场精准对接、赋能与增能深度融合、保护与发展动态平衡三大优化路径，探索以民宿产业驱动乡村振兴的“双轨”新路径，为理解乡村振兴的复杂动力系统提供辩证的理论工具，也为乡村民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民宿产业；推拉理论；内生动力；外源赋能

中图分类号：F323；F71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5)06-0066-10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村旅游业能够激活多元特色产业(邹永广等，2024)，具有多重带动效应，通过激活乡村的经济价值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李金铠等，2025)。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指出“深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发展乡村旅游业构筑了坚实基础。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推进乡村共同富裕(韩磊和徐菲菲，2023)，也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新型路径。民宿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卢慧娟和李享，2020)。在推进现代农业与休闲旅游融合的具体实践中，乡村民宿既是住宿业态和旅居方式的升级，也是文旅融合的深度体现(陈国华和戴其文，2025)，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形载体。从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民宿提质升级”到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政策重点转向“规范发展、提升品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任务，强调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增强乡村地区发展内生动力”；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深化为“因地制宜发展民宿经济”。一系列政策指引将民宿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农民通过发展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项目，拓宽增收渠道。整合乡村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建设“特色村落”“美丽乡村”等重要旅游目的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徐菲菲等，2023)。

学界亦对乡村民宿展开广泛讨论，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民宿的产业经营、空间设计以及可持

*项目来源：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点项目(2024WL09)；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5JYB007)。

作者简介：冯丹娃，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续性发展三大维度。在产业经营层面，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业态，乡村民宿被中央政府定位为带动乡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王斯亮和邱铜铜，2024)。而农文旅融合则是乡村民宿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和典型特征，通过将农业资源与乡土文化、旅游体验进行深度融合的方式，推动乡村民宿产业成为连接城乡的重要载体。随着大众需求的更新迭代，游客不再满足于民宿的基础功能，而愈发重视品质体验与精神共鸣，这就需要民宿管理者在经营中找寻更加直观和可操作的服务提质升级管理工具，有效实现客人满意度与复住率的不断提升(邢博等，2025)。在空间设计层面，民宿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是文化符号的载体。“在地性”的乡村民宿设计理念逐渐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该理念强调对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深刻洞察与高度尊重，以及对当地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聚落形态及社会结构等的深入挖掘与梳理(陈文彬，2024)。营造出主客共创的“家”的氛围，成为区别于标准化酒店的核心特质。将游客对民宿的空间感知作为一种符号消费方式，赋予乡村空间超越其功能价值的意义。在可持续性发展层面，民宿产业发展不是追求投入高、规模大，也不是盲目走品牌化路线。民宿发展要充分考虑市场、区位等因素，科学评估其可行性和必要性，避免盲目开发造成资源浪费(王洛坤和冯维波，2024)。亦有研究聚焦如何打造未来独立的乡村民宿产业理论研究体系，与旅游业进行互动分析，形成标准化的乡村民宿服务流程、服务标准、服务人员素质和岗位要求(马亮和颜亭玉，2023)。

现有文献较多集中于乡村民宿本体的设计运营、文化价值及在乡村振兴影响下的可持续性发展，对于乡村民宿如何借助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进行自主提升，如何拓展乡村振兴发展局面的机理逻辑和实践路径有待深入探讨。本文将挖掘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的内在资源禀赋、主体能动性与情绪价值等内生要素，同时剖析政策引导、市场需求与技术输入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尝试构建一个“内生”与“外源”互动、融合与共生的双轨驱动框架，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更为辩证和系统的理论工具。

二、理论依据与逻辑框架

（一）推拉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源于Ravenstein对人口迁移规律的开创性研究，其核心观点是将人口流动视为流出地的“推力”(如贫困、就业不足)与流入地的“拉力”(如就业机会、高生活质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白鹏飞和李建军，2022)。该理论认为推拉因素往往是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其交互机制远比线性因果关系更为复杂。随着理论的演化，推拉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组织变革、技术采纳与人才流动等领域，并被证实可有效解释复杂行为的非线性生成机制(Chen and Liu，2023)。同时，推拉理论也被广泛运用到旅游领域，在旅游目的地选择上，为检验游客动机和为出游行为提供有效途径，结合心理学理论形成乡村旅游动机研究(郑文俊，2012)。在城市间旅游合作选择上，借助推拉理论，从旅游需求端、供给端和旅游通道三个方面评估经济圈内城市旅游合作程度，分析旅游合作可能存在的问题(何芙蓉和胡北明，2022)。乡村振兴本身是一个涉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要素流动与重组的复杂系统。乡村民宿恰如一个“转换器”：一方面，能够将乡村内部的资源、文化等“推力”要素，与外部的政策、市场、技术等“拉力”要素，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进行整合与转化；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本质上依赖于内生发展能力的“推力”与外源支持系统的“拉力”之间的有效结合与动态平衡(陈佳馨等，2025)。乡村民宿产业的发展无法仅凭内部资源“闭门造车”，也不能完全依赖外部资本“大水漫灌”，必须是内外力量在民宿场域内良性互动的结果，这一互动过程正是推拉理论中“二元结构”与“合力建构”的核心体现，也是其中建构力的核心阐释。因此，将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视为系统内部的“推力”，将“外源赋能”视为系统外部的“拉力”，运用推拉理论构建一个双轨复合解释框架，能够清晰地剖析民宿产业驱动乡村振兴的动态机理，并为优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方向指引。

（二）双轨机制理论分析框架

区域发展是内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与外部系统性力量进行互动（吴越菲，2022）。基于推拉理论，本文提出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的内生与外源双轨机制，旨在通过调动多元要素的交互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循序渐进的动力，该机制的核心在于明确内生系统与外源变量两大范畴及其协同方式。内生系统作为“推力”子系统，根植于乡村内部，是发展的原生动力，主要由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和情感价值三重要素构成，其中，资源禀赋是自然与历史的馈赠，人力资本是人文生活的传承，情感价值是绵延持续的精神体验。内生系统中的事物性质决定了乡村民宿的内生性特征，同时该系统内的各类要素共同构成了乡村民宿难以复制的内生性优势，是其参与市场竞争的价值本源。内部元素凭借其特有属性在常规消费中具有较强的稀缺性，构成强大的潜力市场，其共有特征塑造而成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成为民宿竞争的核心价值。外源变量作为“拉力”子系统，作用于乡村外部，为乡村民宿产业的发展提供导向与催化力。在乡村发展的外部宏观发展格局和综合背景环境的影响下，相关政策、市场需求和智能技术的介入构成了外源变量，形成适宜的拉力作用，其同样包含三重要素：全面的政策保障、多元的市场需求和创新的智能管理，其生成逻辑和作用机制均发生于外部社会系统，综合全面市场环境进行更新迭代。各要素可通过民宿载体作用于具体事物，通过精准化的资源导入与模式创新实现交互流动助力乡村发展，其中，政策保障是各级政府的通力合作，市场需求是消费群体的需求偏好，智能管理是现代技术的灵活运用。正是通过这些要素涌入乡村区域，内部资源价值才能被有效激活。无论是内化演进的内生系统还是综合提质的外源变量，均可以通过旅游互动形成较强的赋能催化效应。

双轨机制的效能并非静态叠加，而是依赖于内核强化与系统融合这一动态优化过程，该过程意味着构成要素需要实现从原始状态向高阶形态的深度转换，无论是内生系统还是外源变量均要针对自身结构与功能进行提质升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主体的能动作用和情绪的价值提供构成了内生系统的优化原理，而政策的精准靶向、市场的响应反馈、管理的智能升级组合为外源变量的调整因素，各要素结合自身特征在合理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和优化，从而更好适应乡村发展。这一优化过程也并非孤立推进，需要在持续不断地自我调节后，突破各自的发展阈值，实现内生与外源的系统融合。依据推拉理论的分析框架，内生动力与外源赋能需要形成协同共振局面，将外部的拉力与内部的推力调节为方向一致、目标清晰的驱动合力，在两方力量中寻求均衡点。外部赋能精准对接内部资源，内部价值及时响应外部市场，形成双轨协同的正向循环。依据推拉理论的动态决策过程，挖掘民宿产业驱动乡村振兴的内生系统与外源变量的各要素组成，根据动态作用的双轨机制系统梳理内外要素复合优化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双轨机制通过对内生推力与外源拉力的动态融合，既避免了乡村资源的浪费，还可以及时调整民宿经营方向，找寻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乡村韧性发展路径，以此撬动产业、生态、文化、组织与人才的全面振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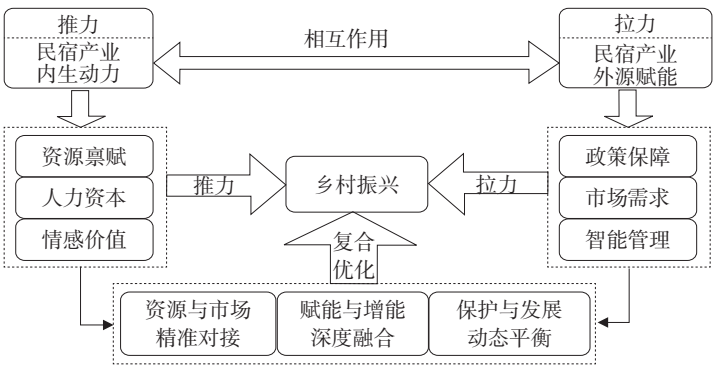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民宿驱动乡村振兴的双轨复合优化框架

三、内核驱动：民宿产业内生动力系统及其效应

（一）资源禀赋奠定振兴根基

民宿产业是引发乡村主体、资源、治理等系统变革的触发点，也是振兴乡村的坚固支点（程金燕等，2025）。资源禀赋构成了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底蕴，其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为民宿产业提供了天然的竞争优势。如何将静态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动态的发展动能，成为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核心议题。自然资源是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的基底。我国地域广袤，自然景观丰富多样，从北国的林海雪原到南方的山水田园，从西部的雄奇地貌到东部的滨海风光，各具特色的自然环境为民宿建设提供了多样化的生态基底。这些自然资源不仅是民宿空间设计的物质载体，更是塑造独特体验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民宿差异化发展的灵魂所在。我国乡村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同地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建筑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

凭借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各具特色的民宿依托自然资源基底进行设计与建设。乡村民宿通过利用空间优势将静态化的自然资源转变为动态化的深度体验，将无形的公共产品转化为有形的市场消费品，从而实现生态价值的经济转换，在聚焦自然资源保护的同时引领乡村经济发展。天然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文化血脉将乡村民宿打造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文化感受和符号消费空间（吕宛青和余正勇，2025）。这种根植于地域禀赋的独特资源成为驱动乡村产业升级、重塑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二）人力资本激活振兴潜能

人力资本是产业振兴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引擎，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技能与知识的积累，更在于其激发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与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作用。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优质人力资源能够推动产业的技术创新、优化生产，改善产业经营各个环节，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杨水根和何松涛，2023）。在乡村民宿场域中，人力资本凭借其主观能动性，成为推动民宿产业生根落地和持续繁荣的根本动力。以农民主体性为依托的内生机制，要求在整个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农民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李海金，2023）。在民宿产业发展中，村民角色实现了从传统农产品生产者向现代服务业参与者乃至创业者的历史性转变。村民是民宿产业收益的核心受益人，受益群体的规模不断壮大会将分散的个体人力资本升级为组织化、制度化的共同体（徐增阳等，2025），乡村发展就拥有了庞大的内生力量。同时，民宿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产生了显著的“人才虹吸效应”，吸引大量外部优质人力资本向乡村流动。这批外来人才通常具备开阔的视野、专业的知识储备与丰富的市场经验，其中包括返乡创业的青年、专业的民宿运营者与设计师等。由当地村民和外来人才组成的人力资本不仅拥有丰富的民宿管理智慧，也具备乡村产业现代化的深刻洞察力，本地村民熟悉风土人情与当地社会网络；外来人才则带来了前沿的市场信息、专业技术与现代化视野。二者通过共同决策、协作经营与知识共享，形成充满活力的“地方性创新共同体”或决策智库，这些是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储备力量。

（三）情感价值凝聚振兴共识

不同于标准化商业性酒店，乡村民宿因主打“有温度的住宿”“有灵魂的生活”和“有情感的体验”而成为旅游中“家”的特殊形式（罗强等，2025）。乡村民宿以一种小规模、个性化和有温度的居住方式，使得游客主动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后获得精神满足（杨艺和吴忠军，2019）。乡村民宿所表现出的情感价值不仅建立于民宿主人与游客之间，也建立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间所产生的情感共鸣。这种基于情感价值的持续互动，远比一次性的旅游消费更能支撑乡村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随着游客体验需求的提升，乡村民宿居住升级为兼具温暖和关怀的交往活动，让游客从被服务的消费者转变为被接纳的参与者。民宿搭建起的情感交融空间使得外来游客和本地居民间建立深度联结的关系网络，成功打破

城乡壁垒。乡村民宿建设不仅使得游客身心具有载体依托，更能激发全新文化创意和多元乡村活动，催生出新的商业机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进而激活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和丰富乡村发展业态(贾珍珍和李明，2024)。文化资源为民宿设计注入独特基因(操宛霖，2025)。我国乡村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俗文化，不同县域拥有独特的历史遗迹、传统习俗和民间艺术。游客可以借助民宿载体参与民俗活动，亲身体验乡村文化的魅力，感受乡村生活的独特韵味。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过程中实现乡村文化传播，丰富村民的情感生活，拓展村民文化表达方式。

四、外部催化：民宿产业外源赋能系统及其作用

（一）政策保障释放乡村振兴新势能

民宿产业发展政策从顶层设计角度对消费市场发出明确信号，鼓励探索者和投资人关注民宿产业。通过完善的制度框架，对民宿产业发展进行系统引导和规范发展，从而提升国家对于乡村振兴发展的关注度。乡村民宿产业搭上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便车，正逢重大发展机遇(郅玉玲和严佳琴，2023)。202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正式将“农文旅融合”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总体框架，鼓励发展新型旅游业态，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浙江省推行的“坡地村镇”建设用地政策，通过“点状供地、垂直开发”的创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民宿项目的用地瓶颈。在莫干山区域，该政策允许民宿利用林地旁的零星地块进行建设，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前提下，为“洋家乐”精品民宿集群的崛起提供了关键的制度合法性，是顶层设计精准赋能地方实践的生动体现。有关民宿产业发展政策直接提升民宿经营的预期收益与社会效益，将人才、资金、技术等关键资源精准引导并稳固吸附到乡村领域。制度保障与政策扶持成为乡村民宿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实践的坚实后盾。

（二）市场需求焕新乡村旅游产业链

市场需求是对游客的偏好、行为和反馈进行总结后的具象化表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旅游消费模式的转变，乡村旅游受到广泛青睐。越来越多的集体活动注意到乡村旅游的疗愈效果(邓源，2025)。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更加重视对于当地风土人情的沉浸式体验。住宿选择也进阶为追求有特色的居住体验，从单纯的住宿休憩转变为追求全方位、深层次的独特体验，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在市场中愈加被重视。游客对乡村生态、民俗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向往，推动乡村由单一的农产品生产地转型为高品质的消费目的地，激发村民将本地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价值。通过对不同游客需求进行精准抓取，市场需求直接催生出各种类型的主题民宿。针对文化探寻者，乡村民宿成为地方知识的“活化课堂”。如在徽州地区，民宿经营者不仅修复古建筑，更组织游客参与徽墨制作、砖雕体验、族谱讲解等活动，将静态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带走的深度文化产品，形成了“住下来，学进去”的消费模式。针对家庭客群，乡村民宿变身“自然教育营地”。依托乡村的农田、山林、溪流等资源，设计诸如昆虫观察、作物种植、星空课堂等亲子活动场所，不仅满足了城市家庭对下一代自然教育的需求，也将乡村的生态资源系统性地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教育产品。针对艺术爱好者群体，乡村民宿成为“乡村美学的策展空间”。一些乡村民宿引入艺术家驻留计划，定期举办小型展览、音乐会、手工艺市集，甚至将乡村民宿本身作为一件艺术作品来打造，这种模式吸引了特定圈层的游客，为乡村注入了前沿的审美活力与话题性。针对高压力的都市精英，乡村民宿发展为“身心疗愈目的地”。结合乡村宁静的环境、健康的食材与温泉、瑜伽、冥想等康养活动，提供短期的“身心修复”套餐，精准对接了现代人对健康管理的迫切需求。“民宿+”新业态的出现为乡村产业链增添多元渠道，需求增加带动供给升级，供给增多刺激需求变动，二者形成紧密衔接，促进乡村发展实现价值延长到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格局。

（三）智能管理精调乡村治理新结构

乡村经济发展动力由传统资源型向创新型发展，乡村民宿产业作为乡村经济的重要载体，正经历从粗放式经营向精细化运营的深刻变革。乡村民宿更加注重高质量的服务体验、敏捷的响应速度和个性化的居住模式。随着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乡村民宿的提质升级借助智能技术提升经营效率。智能管理让乡村民宿得以通过多样化的线上营销平台进行展示，在线预订与媒体营销使乡村民宿直接对接全球消费市场。借助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资源价值重构，利用大数据信息追踪，乡村民宿精准触达目标客群，打破信息壁垒，将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入住率，形成良性循环的民宿产业发展模式。通过利用网络效应，乡村的时空资源、文化场景、生态价值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资产，这种数据化的价值发现机制，既避免了资源闲置，又防止了同质化开发。智能管理通过精准匹配市场需求，改善民宿经营方式的同时促进乡村资源进行合理利用，灵活规避了资源闲置或浪费的情况。通过民宿的数字化升级，在乡村场域内构建起现代化的发展方式，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智慧动能，铺就了乡村产业融合、利益共享的富裕之路。

五、案例呈现与双轨互构机制

（一）典型乡村民宿产业发展实践

为深入透视“内生—外源”双轨驱动机制在现实场域中的复杂运作，本研究选取浙江省莫干山与云南省元阳哈尼梯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民宿集群进行对比分析，二者虽均以民宿产业闻名，但其发展路径生动体现了双轨要素的不同配置与主导模式。

1. 莫干山模式：外源引领与内生跟进的协同演化

莫干山民宿集群的崛起，是外源赋能精准激活内生动力典范，其发展初期，外源赋能系统呈现出强大的初始“拉力”：首先，上海等周边城市的消费升级产生了对“诗与远方”的强烈市场需求，一批外籍人士与设计师成为早期开拓者，引入了精品酒店理念；其次，地方政府敏锐的政策保障，如早期相对宽松的用地政策与后期积极的行业规范，为外来资本与人才提供了制度空间（陈晨等，2019）；最后，智能管理被广泛应用，从早期的在线预订平台到后期的社交媒体营销，使其迅速对接全球消费市场。

在外源力量的强势拉动下，莫干山的内生动力系统被有效激活并逐步跟进。当地的资源禀赋——茂密的竹林、清凉的气候、近代别墅遗存——被外来经营者重新“发现”与“转译”，塑造出“洋家乐”这一独特品牌。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实现了跨越式提升。本地村民从最初的观望、提供劳务，逐渐转变为参与经营、自主创业，甚至出现本土高端民宿品牌。外来精英与本地社群在碰撞中形成新的情感价值共识（吴文智和崔春雨，2023），共同营造出一种兼具国际化视野与乡土情怀的“莫干山生活方式”，此模式展现了外源拉力在先，通过市场与技术的强势注入，催化并重塑内生推力的演进路径。

2. 元阳哈尼梯田模式：内生守护与外源赋能的谨慎耦合

与莫干山不同，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民宿产业发展则呈现出以深厚内生动力为根基的“推力”主导特征。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核心资源禀赋——千年梯田景观、独特的哈尼族村落布局与农耕文化——是其最根本，也是最脆弱的吸引力来源（周小凤和张朝枝，2019）。这里的人力资本与情感价值紧密交织，村民不仅是民宿服务的提供者，更是梯田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其身份认同与梯田生态系统的存续息息相关（马悦柔和保继刚，2024）。

在此背景下，外源赋能系统的介入必须更为审慎，以实现与内生系统的“谨慎耦合”。为此模式提供政策保障的核心在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其对民宿的建筑风貌、建设规模有严格限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发展的“约束性拉力”。市场需求虽然渴望真实的农耕文化体验，但必须被引导至对文化遗产尊重的轨道上，避免过度商业化的表演性消费。智能管理的应用则更多地体现在智慧导

览、游客分流与环境监测上，旨在缓解旅游压力对脆弱生态与文化系统的冲击。在此模式中，外源赋能并非强势引领，而是服务于内生系统的巩固与价值升华，其核心目标是确保民宿发展成为遗产“活化”而非“化石”或“破坏”的过程(高钰桔等，2023)。

（二）内生动力与外源赋能的互构逻辑

上述案例表明，“内生动力”与“外源赋能”并非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而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通过乡村民宿这一载体进行的深度“互构”(Mutual Construction)，且这一互构过程蕴含着内在的逻辑规律。第一，双轨互构遵循时序交替与主导转换的逻辑。在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内生与外源的力量对比与主导角色是动态变化的。莫干山模式体现了“外源启动—内生跟进—协同创新”的序列，而元阳哈尼梯田模式则呈现了“内生根基—外源适配—共生保护”的路径。这表明，成功的民宿产业发展并非固守某一种模式，而在于根据本地初始条件，灵活调整双轨互动的策略与节奏。第二，双轨互构的核心机制是价值转译与意义共振。外源要素(如资本、技术、消费偏好)无法直接作用于乡村，必须经由民宿经营者进行“地方性转译”。例如，莫干山民宿的经营者将国际化的设计理念与本地竹材、石材相结合；元阳哈尼梯田民宿则必须将现代住宿需求转化为不破坏村落肌理的空间解决方案。成功的转译能使外部赋能与内部资源的价值意义产生“共振”，从而形成强大的市场吸引力与社会认同。第三，双轨互构的理想目标是“治理共同体的形成”。超越简单的经济利益分配，双轨驱动的深层意义在于促成由本地村民、外来经营者、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构成的乡村治理新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内生动力确保了发展的基础与合法性，外源赋能提供了新的资源与视野，双方通过持续的对话、协商与协作，共同应对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从“输血”到“造血”，再到“自我循环”的根本性转变。

（三）双轨互构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双轨互构理论前景广阔，但其在实践中仍面临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权利失衡与“内卷化”风险。在资本、技术等外源力量过于强大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外源主导”甚至“外源吞噬”的局面。本地村民可能因知识、资本和话语权的弱势而被边缘化，沦为产业链末端的打工者或土地出租者，其主体性难以发挥。这会导致发展的利益大量外流，内生动力不仅未被激活，反而因遭受挤压而萎缩，最终使乡村民宿产业发展陷入看似繁荣、实则本地社区参与度和获得感低下的“内卷化”陷阱。第二，文化贴现与体验同质化。在市场拉力的驱动下，为迎合大众游客的标准化预期，民宿的“在地性”文化内涵可能被简化、包装成易于销售的表象符号，发生“文化贴现”(Cultural Discount)。例如，深厚的农耕礼仪被简化为拍照背景，独特的生活智慧被商业噱头所取代。这种对内生文化资源的浅层、过度消费，将导致民宿体验趋于同质化，丧失其最核心的竞争力，最终被市场淘汰。第三，制度悬浮与生态阈值。外源的政策保障若不能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日常实践相结合，易出现“制度悬浮”。例如，脱离实际的“一刀切”环保标准可能使小微民宿难以生存，而缺乏监管的鼓励政策又可能导致过度开发。更重要的是，任何产业发展都必须尊重当地的生态承载力与文化承受力这一“不可逾越的阈值”。如元阳哈尼梯田，即便市场需求再旺盛，外源赋能也必须以不破坏梯田水文系统和村落社会结构为绝对前提。

六、“内生+外源”驱动乡村振兴的路径

（一）资源与市场精准对接

在社会生产领域寻找遵循市场价值规律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引导之间寻求平衡。乡村民宿作为商品，其生产与消费过程也存在于社会总生产中。文化体验的生产与消费是乡村民宿区别于传统住宿业态的核心价值与要义所在。在供给侧，乡村民宿的核心使用价值超越住宿功能，实现

资源与市场复合对接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已有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将其凝练为具有独特性的新产品，以提升乡村旅游从原始、静态的发展模式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乡村优势转变。在需求侧，商品的价值规律要求生产必须符合社会需要，乡村民宿产业发展不能一味追求民宿规模扩大，应敏锐洞察并及时反映消费趋势的变化，持续优化产品形态，精准触达游客需求，摆脱同质化竞争，实现有效供给与特定需求的双向共振，从而培育稳定的目标客源，降低获客成本，提升经营效益。此外，还需精准构建双方共赢的良性循环格局。对于经营者而言，意味着可以收获特有客源，减少营销成本投入，实现盈利最大化；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更为便捷地找寻到适合自己的民宿，满足个性化诉求，获得深度体验。对于乡村整体发展而言，乡村民宿成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最佳平台，融入市场洪流中促进民宿产业发展。民宿产业实现了由单一住宿到振兴引擎的层级跨越，实现以宿带产、以产兴村的可持续发展闭环。因此，产业发展政策应实现差异化与精准化，摒弃“一刀切”模式，尊重不同乡村民宿产业发展模式的初始条件与演进逻辑。对于外源启动型地区，政策重点应在于规范市场秩序、引导利益分配公平；对于内生守护型地区，政策则应侧重于强化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援助并严守生态、文化红线。

（二）赋能与增能深度融合

缺乏群众基础的乡村民宿难以顺利建设与持续运营，如果仅依靠外部资本投资开发，当地村民作为廉价劳动力资本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只有通过赋能与增能深度融合才能真正激发内生动力、确保外部效能。“赋能”指向外部知识与资源的系统性注入，包括为乡村民宿及经营主体提供最新理念和创新技术，帮助乡村民宿达到住宿行业标准，最大效能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给予发展保障，市场主体驱动民宿商业化运营，行业协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理念引领，构建由多元主体形成的赋能生态系统助力乡村民宿产业发展。“增能”则强调内部主体能力的根本性建构。所有外部干预的最终目的，都应集中于识别并培育内部的发展潜能，这意味着需利用技术手段梳理增能主体的薄弱之处，经营者必须具备自主学习能力，不断将资源禀赋进行创造性转化，提升自身发展实力；避免过度商业化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让村民成为自身生产生活的主宰者和受益者，建立“以赋能激发增能，以增能承载赋能”的良性循环。因此，要构建起“赋能—增能”导向的协同治理体系。政策工具应从单纯的资源供给，转向致力于培育本地社区与经营主体的自主发展能力。具体而言，应通过设立乡村创业孵化基金、开展民宿经营与管理技能系统性培训、鼓励“新乡贤”与返乡青年牵头成立农民合作社或民宿联盟等方式，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在资本。政府的角色应从主导者转变为平台搭建者、服务提供者与规则维护者，确保外部资源能高效转化为内生发展的核心资本。融合发展后当地村民将成为直接受益人，依靠主人翁意识促生具有自我更新与进化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三）保护与发展动态平衡

保护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于守好生态安全边界（徐成芳和潘欣欣，2025）。乡村民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超越僵化保护与盲目开发的二元对立，致力于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积极的平衡，这种平衡的本质，是在创造经济价值、焕发资源活力的同时，将生态与文化干扰降至最低，从而实现多重增值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所拥有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是独一无二的价值禀赋，这些不可复制的乡村特质是民宿避免同质化竞争的核心所在。由民宿建设出发，应保护的远不止于古建筑，还应对自然风貌合理利用、对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对农耕机理延续活化，只有将资源作为加持力量转化为体验价值才能筑牢民宿发展根基。民宿产业的发展需要依靠独特的文化资源，其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所在乡村拥有的不可复制性资源，原始的自然生态、传统的文化习俗和真实的生活氛围构成了无法替代的根本价值。将发展重心转移到弘扬传统民俗的道路，让传统建筑在保护中焕发新生，推动价值转化，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馈。保护与发展动态平衡才是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发展为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保护让发展拥有独特魅力，构建“以发展促保护，以保护优发展”的循环机制，以此实现

民宿长远发展。因此，发展乡村民宿产业，要建立健全基于生态与文化红线的动态监管机制。在鼓励民宿产业发展的同时，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保护性政策框架。建议推行乡村民宿开发负面清单制度，明确生态敏感区与文化遗产核心区的开发限制。同时，引入绿色发展积分等激励政策，对在环保、文化传承与社区共融方面表现卓越的民宿给予财税、融资与营销支持，引导产业走向“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良性轨道。

民宿产业驱动乡村振兴是一个由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工程。内生动力系统是其本源性力量，外源赋能系统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催化性支持。内生动力与外源赋能并非彼此孤立或简单叠加，而是在乡村民宿这一特定场域中呈现出深刻的互构关系。成功的乡村民宿产业发展实践表明，唯有当外部的赋能精准激活并滋养内部的发展潜能，内部的价值创造又能有效响应并引导外部的市场与技术支持，才能形成双轨协同、正向循环的驱动合力。资源与市场的精准对接、赋能与增能的深度融合、保护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是实现双轨复合驱动的关键，这三条路径共同确保了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包容性与发展韧性。

参考文献

[1] 邹永广, 衷浩滢, 崔一付.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评价及其提升路径[J]. 经济地理, 2024, 44(8): 201−210.

[2] 李金铠, 李瑞香, 魏伟. 基于国家示范县的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路径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5, 44(2): 122−128.

[3] 韩磊, 徐菲菲. 共同富裕视域下旅游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框架、典型案例与对策建议——基于“高质量空间生产”框架[J]. 改革与战略, 2023, 39(6): 91−104.

[4] 卢慧娟, 李享. 基于IPA分析法的民宿旅游吸引力研究——以北京城市核心区四合院民宿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0, 39(1): 112−117.

[5] 陈国华, 戴其文. 农文旅融合下乡村民宿发展的特征、机制与影响[J]. 社会科学家, 2025(3): 83−89.

[6] 徐菲菲, 剌利青, 严星雨, 等. 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述评[J]. 旅游科学, 2023, 37(4): 1−18.

[7] 王斯亮, 邱铜铜. 中国地方政府制定乡村民宿发展政策的多元行动逻辑[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4, 38(3): 22−30.

[8] 邢博, 谢丁丁, 李诗韩. 乡村民宿精益服务: 基于顾客网络评价的量表开发与有效性检验[J]. 旅游科学, 2025, 39(9): 129−148.

[9] 陈文彬. 乡村民宿设计在地性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 45(12): 188+198.

[10] 王洛坤, 冯维波. 乡村民宿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以重庆城口县河鱼乡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 45(4): 247−257.

[11] 马亮, 颜亭玉. 中国乡村民宿发展研究综述与展望[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3, 44(12): 165−170.

[12] 白鹏飞, 李建军. 智慧农业创新动力机制: 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框架[J]. 科学管理研究, 2022, 40(1): 130−136.

[13] 郑文俊. 基于推拉理论的柳州市乡村旅游动机实证分析[J]. 南方农业学报, 2012, 43(10): 1606−1610.

[14] 何芙蓉, 胡北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旅游合作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9(4): 80−88.

[15] 陈佳馨, 申始占, 王鹏飞. 偏远山区乡村旅游嵌入乡村振兴: 问题透视、路径建构与破解思路[J]. 税务与经济, 2025(1): 60−67.

[16] 吴越菲. 内生还是外生: 农村社会的“发展二元论”及其破解[J]. 求索, 2022(4): 161−168.

[17] 程金燕, 宋昌耀, 厉新建, 等. 乡村振兴的民宿力量: 逻辑、机制与路径[J]. 旅游学刊, 2025, 40(9): 52−68.

[18] 吕宛青, 余正勇. 经济与情感: 后现代消费中乡村民宿空间符号建构的双重逻辑及机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2(1): 106−113+203−204.

[19] 杨水根, 何松涛. 数字经济助推产业融合发展了吗?——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3, 44(4): 114—120.

[20] 李海金. “外源内生”: 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J]. 人民论坛, 2023(17): 56−60.

[21] 徐增阳, 杜亚楠, 杜猛. 农村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J]. 华东经济管理, 2025, 39(1): 52−62.

[22] 罗强, 白凯, 王馨, 等. 乡村民宿主客共创的“家感”研究——以四川龙门山·柒村为例[J]. 旅游科学, 2025, 39(2): 85−106.

[23] 杨艺, 吴忠军. 符号与景观:民族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生产研究——基于程阳八寨鼓楼的田野调查[J].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 2019, 39(4):

983-989.

[24] 贾珍珍, 李明.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作用机理、现实难题与突破路径[J]. 学术交流, 2024(11): 125-134.

[25] 操宛霖. 乡村振兴背景下环境设计与民宿发展的融合[J]. 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 2025, 47(2): 192.

[26] 郅玉玲, 严佳琴.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民宿发展研究综述[J]. 农业经济, 2023(8): 45-47.

[27] 邓源. 向往的“村游”: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文化和旅游的实践形态[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8): 1-9.

[28] 陈晨, 耿佳, 陈旭. 民宿产业驱动的乡村聚落重构及规划启示——对莫干山镇劳岭村的案例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S1): 67-75.

[29] 吴文智, 崔春雨. 民宿主人角色呈现对消费者情感认同生成的影响——基于莫干山网红民宿的质性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4(6): 26-35.

[30] 周小凤, 张朝枝.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演变与互动机制[J]. 人文地理, 2019, 34(3): 154-160.

[31] 马悦柔, 保继刚. 旅游发展初级阶段乡村非正规就业的形成逻辑——以元阳哈尼梯田为例[J]. 旅游学刊, 2024, 39(11): 96-107.

[32] 高钰桔, 毛志睿, 陈笑葵, 等.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乡村聚落韧性测度及优化策略——以多依树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 43(8): 220-228.

[33] 徐成芳, 潘欣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安全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及价值意蕴[J]. 学术交流, 2025(9): 29-41.

[34] Chen X, Liu 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young people's short video switching behaviour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J]. The Electronic Library, 2023, 41(2/3): 169-185.

（**责任编辑**：徐　源）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Exogenous Empowerment: Research on the Dual Track Composite Drive of Rural Homesta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FENG Danwa, MENG Ji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Rural homestays play a role in integrating rural resources and activating multiple values, serving as a key link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 and market demand,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ual-track composite driving framework of "endogenous-exogenous", systematically explain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homestay industr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homestay industr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inherent resource endowment, solid human capital, and unique emotional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annot do without the "exogenous empowerment" of comprehensive policy guidance, diverse market demands, and innovativ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in the external system.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exogenous empowerment" mutually stimulate and co-evolve. This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ree optimization paths: precise matching of resources and markets, deep integration of empowerment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dynamic balance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exploring a new "dual-track" path for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homestay industry. It provides a dialectical theoretical too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dynamic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homestay industr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homestay industry; push-pull theory; endogenous motivation; exogenous empowerment